

多样性与单位嵌入：在华外籍 高技术人才的居留意愿研究^{*}

王文彬 李晓涵

【摘要】“引才用才需留才”，分析外籍高技术人才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可以更好地针对他们的特殊性进行政策支持和跨国社区治理。本文使用在华生活的外国人调查数据，考察了社会网络和社会参与对其居留意愿的影响，并分析了这些影响在不同地区的差异化特征。研究发现：第一，无论是族际交往意愿、累积因果网络、社会支持网络，还是社会参与认知或社会参与行为等因素，都在外籍高技术人才的居留意愿决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第二，广州、杭州、义乌的外籍高技术人才体现了族裔社区和单位组织的协同作用；第三，长春的外籍高技术人才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主要通过自身人力资本和单位支持嵌入中国社会。鉴此，各城市应系统化建设涉外服务体系，结合当地产业结构精准引进外籍高技术人才，对其进行定期评估与动态调整，充分利用族裔社会资本和单位支持深化社会网络建设，提高其社会参与的频率和质量，提升其居留意愿。

【关键词】 社会网络 社会参与 居留意愿 外籍高技术人才

【作者简介】 王文彬，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晓涵，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 - 1125 (2025) 02 - 0021 - 23

^{*} 本文系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新汉学计划项目“制度、空间与网络下的适应策略研究：基于在长外籍高管群体的分析”（21HTS02）的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中国要坚持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促进国际合作,共建“一带一路”。作为全球创新活动中重要的人力资本,外籍高技术人才的引进和居留问题一直以来都受到我国政府的高度关注。自 1983 年出台《国务院关于引进国外人才工作的暂行规定》后,^①我国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规章和制度,如《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②“两证整合”、^③“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⑤2023 年 9 月 15 日,为了方便在华外国人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了新版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五星卡),^⑥简化了外国人来华签证申请表。此举深入贯彻人才强国战略,推动海外人才来华工作许可、签证与居留的有机衔接。

中国从移民输出国转向移民输入国,外籍高技术人才是全球经济活动中重要的资源要素。目前,在华外籍人才研究主要集中在“迁移”而非“停留”,而要让其发挥应有的作用,不仅取决于谁会迁移,而且取决于谁会留下来,^⑦这可以通过其居留意愿来体现。第一,居留意愿虽不代表外籍人才最终的迁移结果,但可以被视其行动的必要前提。那些真正想要居留的外籍高技术人才都有过相关的决策,这为本文预测其流动方向提供了一定的线

① 参见焦京虎:《引进国外智力三十年回顾与未来发展战略展望》,中国国际人才交流与开发研究会论文,北京,2013 年 7 月,第 50 页。

② 参见《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 https://www.gov.cn/zhengce/2021-12/25/content_5712892.htm, 2023 年 9 月 4 日。

③ 参见《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事项说明》, https://www.gov.cn/fuwu/2020-06/08/content_5518006.htm, 2023 年 9 月 4 日。

④ 参见《国家外国专家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外交部 公安部关于全面实施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的通知》, <https://fuwu.most.gov.cn/r/cms/zwpt/web/pdf/wgrlhq/781499dc-89d1-4027-a052-f3a207d5bc9c.pdf>, 2023 年 9 月 8 日。

⑤ 参见《司法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https://zqyj.chinalaw.gov.cn/readmore?id=3654&listType=1>, 2023 年 9 月 8 日。

⑥ 参见《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新版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 <https://www.nia.gov.cn/n741440/n741542/c1599039/content.html>, 2023 年 9 月 16 日。

⑦ 参见 Kim Korinek, Barbara Entwisle and Aree Jampaklay, Through Thick and Thin: Layers of Social Ties and Urban Settlement among Thai Migran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70 (5), 2005, pp. 779-800。

索。^① 居留意愿能够直接影响流动人口的迁移行为。^② 韩淑娟等的研究表明，居留意愿不仅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个体下一步的流动方向，更重要的是，居留意愿与流动行为的协同性越来越高。^③ 第二，居留意愿本身就有重要意义，它反映了外籍高技术人才在一定时期内的迁移经历、社会网络观念及态度的转变。但是，在以往关于居留意愿的研究中，国外文献主要集中在南—北流动，即外籍高技术人才从第三世界国家流向工业化国家，或从生活水平较低的国家流向西欧、北美等发达地区，对北—南流动和南—南流动的研究相对缺乏。国内文献关于居留意愿的研究较少，主要从移民输入国的角度出发，侧重对农民工群体迁移流动的研究，^④ 鲜见对外籍高技术人才的研究，也较少关注在移民过程结束后社会网络作用的延续问题。^⑤

为弥补上述不足，本文依据不同的城市层级、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才环境政策，参考科学技术部外籍高技术人才吸引力指数的样本城市范围，^⑥ 选择长春、广州、杭州、义乌4个城市作为分析样本，考察外籍高技术人才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广州、杭州和义乌等典型的移民城市拥有较为成熟的族裔网络和累积因果网络，显著影响了外籍高技术人才的族际交往意愿及社会参与情况，包括社团参与、族裔社区的参与形式以及在华公共参与的观念；而长春等潜力型城市缺乏类似的族裔资本和累积因果效应，主要通过单位嵌入中国社会，其社会网络的基础型、日常型和高度选择型建构情况以及社会参与和认知水平与前者存在显著差异。文章使用2019年在华工作的外国人调查数据，辅以长春子数据（2017—2018年），以外籍

① 参见 Jørgen Carling and Silje Vatne Pettersen, Return Migration Intentions in the Integration – Transnationalism Matrix,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Vol. 52 (6), 2014, pp. 13 – 30.

② 参见姚烨琳：《流动经历与社会融入：在沪外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9期，第95～104页。

③ 参见韩淑娟、颢慧玲、武汉祥：《基于 Order Probit 模型的家庭化流动影响因素分析》，《经济问题》2017年第1期，第92～95页。

④ 参见姜春云：《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社会网络的影响与机制》，《青年发展论坛》2022年第2期，第32～41页；赵延东、王奋宇：《城乡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获得及决定因素》，《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4期，第10～17页；王玉君：《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研究——基于十二个城市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人口研究》2013年第4期，第19～32页。

⑤ 参见王文彬、曹洋：《国际移民的差异性网络构建及融入效用发挥——基于 SFRC (2018) 长春样本的分析》，《青年探索》2019年第5期，第5～18页。

⑥ 参见《2019年“魅力中国——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主题活动结果发布》，https://www.most.gov.cn/kjbgz/202011/t20201126_169734.html, 2023年11月26日。

高技术人才为研究对象，探讨社会网络和社会参与对其居留意愿的影响机制。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外籍高技术人才研究及其居留策略的多维分析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世界性人力资本自由流动的加深，中国正逐渐从移民输出国转向移民输入国。然而，跨国移民的定义在经历了多次修订和调整，仍然缺乏统一标准。官方文件或相关法律法规多以“外国人”“外国专家”等术语称之。联合国将移民定义为：任何改变其常驻居住地的人，即在某国有固定居住场所并长时间居住生活的人。^① 根据改变常驻居住地的时间，移民一般分为常住居民、移居另一个国家一年及以上的长期国际移民（long-term immigrant）和移居另一个国家三个月以上且一年以下的短期国际移民（short-term immigrant）。^② 国际移民组织（IOM）则将移民定义为“个人自主做出移民选择，离开本人出生国或常住国，跨越国界，在另一国家定居并长期或短期居住的人”。^③ 陈玲根据移民的边界是否跨越了国家范围，将移民分为国际移民和国内移民两类。^④ 王双燕将我国的国际移民定义为跨越了主权边界，并在华工作、学习的外籍人口。^⑤ 罗刚指出，跨国移民的迁移主体是持有外国国籍的自然人，跨越国界，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居住三个月以上，或者预期居住三个月以上的人。^⑥ 钟实将外国人居留的标准设定为离开出生地，以居留为目的，自愿进入中国境内，并在中国居住满 180 天的自然人。^⑦ 周敏等将国际移民定义为跨越主权国家边

① 参见“联合国关于移民的定义”，<https://refugeesmigrants.un.org/zh/definitions>，2023 年 5 月 8 日。

② 参见《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报告》，<https://documents.un.org/doc/undoc/gen/n21/071/02/pdf/n2107102.pdf>，2023 年 12 月 15 日。

③ 国际移民组织：《移民关键术语》，<http://www.iom.int/key-migration-terms>，2023 年 5 月 8 日。

④ 参见陈玲：《支持网络与社会融合——基于在杭外国人调查的分析》，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 年，第 6 页。

⑤ 参见王双燕：《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地位获得：对在杭外国人的分析》，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 年，第 6～7 页。

⑥ 参见罗刚：《论我国移民、非法移民概念的界定》，《政法论丛》2012 年第 3 期，第 69～75 页。

⑦ 参见钟实：《中国移民管理语境下“国际移民”的明晰与解读》，《北京警察学院学报》2019 年第 4 期，第 26～32 页。

界，以非官方身份在非本人出生地居住达一年以上的人。^① 综合以上权威机构和学者的定义，国际移民的定义一般有以下标准：一是带有一定的目的性，跨越国家的边界；二是离开本人祖籍或常住国并居住一定的时长，在此期间，移民既可能选择加入接收国的国籍，也可能保留原国籍；三是持有有效的居住证件或在接收国有工作、组建家庭等稳定的社会关系。目前，学界对国际移民的居留时间尚未达成一致，而且跨国公司的“候鸟型”移民可能会因此被排除在外。因此，本文从迁移主体和迁移目的出发，将国际移民界定为跨越国家边界、在中国获得合法身份的外国人，不包括短期入境旅行、就医的外籍人口。

既有研究指出，外籍移民来华的主要原因是看好中国的经济发展潜力，但其在华长期停留和融入的可持续性仍面临一定挑战。^② 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跨国流动出现了新的变化：多元化增强、不确定性增加、从长期移居向暂时移居转换。^③ 另一方面，不同国别群体的在华适应策略具有显著的共性：浅层融入、深度区隔、^④ 过客家户、^⑤ 倾向于本国社会网络的构建、^⑥ 形成相对封闭的小社会、^⑦ 形成聚集性社会空间、很少参加当地人的活动。^⑧

（二）社会网络、社会参与和居留意愿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外籍高技术人才，从“人在环境中”出发，探索其“与谁交往”和“交往内容”等，即社会网络和社会参与。第一，社会网络可以提供支持和资源，促使个体更好地融入新社会。这些网络包括家庭、朋

① 参见周敏、林闽钢：《族裔资本与美国华人移民社区的转型》，《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3期，第36~48页；李明欢：《国际移民的定义与类别——兼论中国移民问题》，《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第1~10页。

② 参见段成荣、邱玉鼎：《1960~2020年在中国国际移民变动情况研究》，《南方人口》2023年第2期，第1~11页。

③ 参见Bingyu Wang, Time in Migration: Temporariness, Precarity, and Temporal Labour amongst Chinese Scholars Returning from the Global North to South,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Vol. 46 (11), 2019, pp. 2127-2144.

④ 参见周大鸣、杨小柳：《浅层融入与深度区隔：广州韩国人的文化适应》，《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第51~60页。

⑤ 参见牛冬：《“过客家户”：广州非洲人的亲属关系和居住方式》，《开放时代》2016年第4期，第108~124页。

⑥ 参见梁玉成：《在广州的非洲裔移民行为的因果机制——累积因果视野下的移民行为研究》，《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1期，第134~159页。

⑦ 参见刘云刚、谭宇文、周雯婷：《广州日本移民的生活活动与生活空间》，《地理学报》2010年第10期，第1173~1186页。

⑧ 参见李志刚、杜枫：《“跨国商贸主义”下的城市新社会空间生产——对广州非裔经济区的实证》，《城市规划》2012年第8期，第25~31页；许涛：《广州地区非洲人的社会交往关系及其行动逻辑》，《青年研究》2009年第5期，第71~86页。

友、邻里和社区组织。第二，社会参与度可以影响个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通过研究移民参与社会活动的程度和频率，了解他们对所在社区的认同感，以及他们是否倾向于长期居留。综上所述，建立一个以社会网络和社会参与为核心的研究框架，有助于揭示外籍高技术人才在新环境中的适应过程和居留意愿的形成机制。

社会网络对移民的居留决策具有重要影响，能促使其从暂居到永居。^①新的朋友和支持关系是促使移民生成归属感和居留意愿的重要因素。^②在朋友类型上，主要有同族朋友论和东道国朋友论。

周敏在《唐人街：深具社会经济潜质的华人社区》一书中描述了唐人街如何帮助新移民构建新的社会网络并提供社会支持，使那些缺乏正规教育和语言能力的新移民获得居留权利以及向上流动的机会。^③王春光的《流动中的社会网络：温州人在巴黎和北京的行动方式》一文与周敏的上述这部书共同关注了一个主题：华人在移入国是如何构建社会网络并使用这种社会网络获得社会资本。^④就波兰的乌克兰移民而言，与当地居民建立社会网络能显著提升其留在波兰的意愿。此外，移民与当地人的互动以及在波兰获得的工具性和情感性社会资本会增强其对居住城市的依恋，进而转化为居留意愿。^⑤姚烨琳对在上海的外籍移民进行了调查，分析了他们从迁出地到迁入地的迁移经历，以及经济融入、社会文化融入、心理融入对居留意愿的影响。其中，中国朋友网络的国家属性和社会关系网络的稳定程度，是影响该移民群体居住城市适应和满意程度的重要指标。^⑥

郭小弦等对西安的外籍移民的社会融合和居留意愿进行探析，发现外籍移

① 参见 Kim Korinek, Barbara Entwisle and Aree Jampaklay, Through Thick and Thin: Layers of Social Ties and Urban Settlement among Thai Migran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70 (5), 2005, pp. 779–800。

② 参见 Julie Drolet and Gayatri Moorthi, The Settlement Experiences of Syrian Newcomers in Alberta: Social Connections and Interactions, *Canadian Ethnic Studies*, Vol. 50 (2), 2018, pp. 101–120。

③ 参见周敏：《唐人街：深具社会经济潜质的华人社区》，鲍霭斌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61~178页。

④ 参见王春光：《流动中的社会网络：温州人在巴黎和北京的行动方式》，《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3期，第109~123页。

⑤ 参见 Sabina Toruńczyk-Ruiz and Zuzanna Brunarska, Through Attachment to Settlement: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Determinants of Migrants' Intentions to Stay,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Vol. 46 (15), 2020, pp. 3191–3209。

⑥ 参见姚烨琳：《流动经历与社会融入：在沪外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9期，第95~104页。

民的同族裔社会网络可以有效促进其在华居留意愿。^① 比琳达·I. 雷耶斯 (Belinda I. Reyes) 认为, 流入地的社会互动行为可以对居留意愿产生正向影响。^② 也有学者认为, 母国的社会参与始终与所有类型的回归意图呈正相关。^③ 如果外籍人才权衡了留华获得的信息、资源和社会支持, 认为返回母国后难以满足自身的职业发展或生活需求, 那么也可能增强居留中国的意愿。卡罗琳·B. 布列特 (Caroline B. Brettell) 等在研究中发现, 居留地社会网络和社区参与是形成地方归属感的重要因素, 往往会促使移民形成永久定居意愿。^④

鉴于国际移民流动的增加和日益多样化的格局, 学者们对跨国移民的“留”和“流”做出了基于不同种族的研究假设和影响因素探讨。^⑤ 不同的返回原因之间存在竞争甚至矛盾的关系,^⑥ 不能合理解释和预测中国的跨国移民行为。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都是在中国工作的一代跨国移民, 他们出生在国外, 拥有外国公民身份, 母国的社会网络、活动参与经历很有可能对他们的居留意愿造成影响。^⑦ 基于此, 本文从移民社会网络理论和跨国主义视角构建研究框架, 进行新的尝试。

移民社会网络理论是由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道格拉斯·S. 梅西 (Douglas S. Massey) 等提出的, 指跨国移民在移民前后形成的, 在流出地和移入地因

① 参见 Xiaoxian Guo, Qian Zhang and Yaxin Cheng et al., Social Integration and Residence Intention of Foreigners in Western China: Evidence from Xi'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Vol. 19 (17), 2022, pp. 1-16。

② 参见 Belinda I. Reyes, Immigrant Trip Duration: The Case of Immigrants from Western Mexico,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35 (4), 2001, pp. 1185-1204。

③ 参见 Özge Bilgili and Melissa Siegel, To Return Permanently or to Return Temporarily? Explaining Migrants' Intentions,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Vol. 6 (1), 2015, pp. 14-32。

④ 参见 Caroline B. Brettell and James F. Hollifield, *Migration Theory: Talking across Disciplines*, New York: Routledge, 2022, pp. 194-232。

⑤ 参见 Gusta G. Wachter and Fenella Fleischmann, Settlement Intentions and Immigrant Integration: The Case of Recently Arrived EU-immigrants in the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Vol. 56 (4), 2018, pp. 154-171; Valentina Mazzucato, The Double Engagement: Transnationalism and Integration. Ghanaian Migrants' Lives between Ghana and the Netherlands,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Vol. 34 (2), 2008, pp. 199-216; Yoshimi Chitose, Remain or Return? Return Migration Intentions of Brazilian Immigrants in Japa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Vol. 60 (4), 2021, pp. 178-192。

⑥ 参见 Özge Bilgili and Melissa Siegel, To Return Permanently or to Return Temporarily? Explaining Migrants' Intentions,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Vol. 6 (1), 2015, pp. 14-32。

⑦ 参见 Corrado Bonifazi and Angela Paparusso, Remain or Return Home: The Migration Intentions of First-generation Migrants in Italy,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Vol. 25 (2), 2018, pp. 6-11。

血缘、地缘等因素形成的一系列社会关系,^① 是移民空间聚合体的重要议题。

妮娜·格里克·席勒(Nina Glick Schiller)等关注全球化经济中的移民,对不同民族、国家在规范移民从事的活动及塑造身份认同方面起的作用提出了质疑,并在1992年最早提出跨国主义的概念。^② 跨国主义研究分为两个阶段。最初,学者们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单一地理位置,如关注移民的流入国,以及母国的“家”和“归属感”等话题。^③ 当时移民的流动方向基本上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④ 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而在2014年左右,学者们开始将注意力转向研究母国和居住国的跨国主义现象。^⑤ 国际移民的社会、经济、文化现象并不总是完美地重叠在一个地理区域上,而是同时参与母国和居住国的活动,促使人口、商品、资金和思想等在不同民族、国家之间来回流动。

本文承袭跨国主义观点,认为居留意愿至少受到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同时取决于一个人对移出地和移入地的地方归属感。因此,本文分别从移出地(母国)和移入地(中国)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参与角度出发,探究影响在华外籍高技术人才居留意愿的主要因素,并提出具体的研究假设。

1. 社会网络对居留意愿的促进效应假设

在跨国离散的大背景下,经济全球化加速了更大范围的族裔散居现象。来自不同国家的人重组群体,重构历史,重新设定共同体的想象。在现有文献中,基于在华角度的移民社会网络通常被分为两类:一是社会交往对象主要为外国人的移民社会网络,二是社会交往对象主要为中国人的移民社会网络。

① 参见 Douglas S. Massey and María Aysa-Lastra, Social Capital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from Latin Americ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pulation Research*, Vol. 2011 (1), 2011, pp. 1-18。

② 参见 Nina Glick Schiller, Linda Basch and Cristina Blanc-Santon, Towards a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on Migration: Race, Class,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Reconsidered,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Vol. 645 (1), 1992, pp. 1-25。

③ 参见 Eva Kristine Østergaard-Nielsen, Transnational Political Practices and the Receiving State: Turks and Kurds in Germany and the Netherlands, *Global Networks*, Vol. 1 (3), 2001, pp. 261-282; Nadjé Al-Ali and Khalid Koser, *New Approaches to Migration? 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Home*, London: Routledge, 2002, pp. 51-67。

④ 参见 Douglas S. Massey,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Immigratio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510 (1), 1990, pp. 60-72。

⑤ 参见 Ernesto Castañeda, María Cristina Morales and Olga Ochoa, Transnational Behavior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Migration Studies*, Vol. 2 (3), 2014, pp. 305-333。

第一，以血缘、乡缘、情缘为纽带建立起来的族裔属性社会网络，大部分表现出强烈的聚居偏好，在帮助移民适应文化冲击和提供信息、工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强关系有助于扩展移民的社会网络，帮助其适应在中国的生活，同时通过社会参与的方式重构社会网络。^① 例如，广州小北路、上海古北、北京望京等跨国移民聚居区，有发达的族裔网络和族裔经济，并且在商业、医疗、教育等事务上自给自足。这类社会网络联结着移出地和移入地，也是移民到达后社会网络构建的纽带。^② 据此，提出累积因果假设。

研究假设 1：外籍高技术人才的累积社会网络越强，在中国的居留意愿越强。

第二，族际接触通常被认为是跨文化社会融合的重要指标。^③ 在既有研究中，中国社会网络和中国社会参与得到了部分学者的关注：国际移民在中国形成的特殊网络可以显著促进社会融入，^④ 并且以中国人为主的本地社会网络也可以显著提升外籍人口的居留意愿。^⑤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 19 世纪就已经开始了对“跨文化适应”的研究，主要着眼于进入新文化环境中的移民适应研究。移民与主流社会的互动是重要的指标。那些打算居留的外籍高技术人才，有动机去投资中国本地化社会网络，并且通过一些社会活动积极地融入中国。只有通过与中国社会的跨族群接触，外籍高技术人才可能发现在华生活的吸引力，从而促使他们长期居留。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也可能产生相反的影响，即在族际接触的实际过程中原有想象被打破，从而促使他们拒绝长期居留。据此，提出主流文化适应假设。

研究假设 2：外籍高技术人才的族际交往意愿越强，在中国的居留意愿越强。

第三，移民社会网络具有信息传递、降低迁移成本与风险的作用。不同圈层的移民支持网络在增强高技术移民自身延续性方面具有一定差异性。个体社会资本强的外籍移民拥有可以突破地理界限，形成无障碍候鸟式流动的

① 参见许涛：《广州地区非洲人的社会交往关系及其行动逻辑》，《青年研究》2009 年第 5 期，第 71～86 页。

② 参见梁玉成：《在广州的非洲裔移民行为的因果机制——累积因果视野下的移民行为研究》，《社会学研究》2013 年第 1 期，第 134～159 页。

③ 参见 Thomas F. Pettigrew,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 49, 1998, pp. 65–85。

④ 参见王文彬、曹洋：《国际移民的差异性网络构建及融入效用发挥——基于 SFRC (2018) 长春样本的分析》，《青年探索》2019 年第 5 期，第 5～18 页。

⑤ 参见姚烨琳：《流动经历与社会融入：在沪外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9 期，第 95～104 页。

重要人力资本。^① 这为他们构建社会网络和拓展迁移范围提供了有力保障,使其能够同时扎根于移出地、移入地,有时甚至还包括第三国。^② 在中国社会的嵌入中,他们大多租住在当地居民的社区中,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格局,具有强烈的经济嵌入和社会融入属性,并形成移民局、社区等多部门协同共管的新模式。部分外籍高技术人才拥有丰富的国际网络和族裔网络资源,在文化与族裔经济的主动聚集效应和受多重因素影响的社会排斥机制的双重作用下,远离主流社会进行生活。他们依赖族裔网络,如果可以在居住地形成自给自足的舒适区,那么很可能不会出现再次迁移的行为。此外,部分外籍高技术人才会以工作单位或社会组织为中介,帮助他们适应当地主流文化、经办各类事务,并与当地社会保持一定的社会距离。此类人群可能被中国的经济形势吸引,为了寻求较好的平台和获取经济收益,也会存在一定的居留倾向。

基于此,分别对在华外籍高技术人才以个体社会资本为主、以亲缘性社会网络为主和以单位性社会网络为主进行考察,提出社会支持网络假设。

研究假设 3a: 外籍高技术人才的个体社会资本越强,在中国的居留意愿越强。

研究假设 3b: 外籍高技术人才的亲缘性社会支持越强,在中国的居留意愿越强。

研究假设 3c: 外籍高技术人才的单位性社会支持越强,在中国的居留意愿越强。

2. 社会参与对居留意愿的促进效应假设

既有研究表明,具有一定社会经济地位的人通常社会参与意识更强。^③ 长春的外籍高技术人才的主要构成为企业的管理人员、技术总监和高校科研人员,其本身就具有合法的居留身份、较强的人力资本和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同时,长春的外籍高技术人才具有显著的单位性、集中性和地域性,^④ 大多服务于本城市的支柱产业和最具有优势资源的平台,如一汽集团及其子公司,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和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

① 参见 Jonathan V. Beaverstock, *Transnational Elites in Global Cities: British Expatriates in Singapore's Financial District*, *Geoforum*, Vol. 33 (4), 2002, pp. 525 - 538。

② 参见 Valentina Mazzucato, *The Double Engagement: Transnationalism and Integration. Ghanaian Migrants' Lives between Ghana and the Netherlands*,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Vol. 34 (2), 2008, pp. 199 - 216。

③ 参见王新松:《公民参与、政治参与及社会参与:概念辨析与理论解读》,《浙江学刊》2015年第1期,第204~209页。

④ 参见王文彬、曹洋:《国际移民的差异性网络构建及融入效用发挥——基于 SFRC (2018) 长春样本的分析》,《青年探索》2019年第5期,第5~18页。

物理研究所（简称长春光机所）等高校及科研院所，属于典型意义上的单位组织，可获得较为明显的优势地位和衍生资源。^① 在计划经济时代，单位中的个人不仅可以获得常规意义上的企业福利，而且可以得到“包括住房、子女教育、医疗、食堂、浴室、电影院”等一系列社会支持。^② 虽然国有企业改革导致单位制的影响力减弱，但是其遗留的影响依然存在，可以为外籍高技术人才提供包括人才引进、经济支持、住房（宿舍）、子女入学等方面的社会支持，并定期举办外国专家午餐会、文化交流等活动，提高他们的归属感。

广州、义乌等城市的移民社会网络有发达的国际属性，其特征为拥有封闭的社交圈，浅层融入、深层区隔，部分群体形成了聚集性空间，与中国的主流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因此，他们倾向于返回原籍国或者计划流动到其他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参与可能是有限的或高度选择性的，缺乏了解和参与当地社会活动的意愿，学习目的地国家语言的动力不足，更倾向结识本国的朋友或者其他国家的外国朋友。

本文分别从社会参与认同和社会参与行为提出假设。

研究假设 4a：外籍高技术人才的社会参与认同越强，在中国的居留意愿越强。

研究假设 4b：外籍高技术人才的社会参与行为越多，在中国的居留意愿越强。

三、数据来源、变量与描述性统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在华生活的外国人调查（Survey on Foreign Residents in China, SFRC）。SFRC 开始于 2017 年，是由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主持的综合性、连续性的大型截面调查。SFRC 调查员在广州、长春、杭州、义乌、西安、兰州和徐州 7 个城市出入境办证大厅，对在一定时期内进入办证大厅的所有 18 周岁以上的外国人进行调查。

自 2013 年 7 月 1 日起，我国开始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

① 参见田毅鹏：《“单位研究”70 年》，《社会科学战线》2021 年第 2 期，第 211～221 页。

② 参见田毅鹏：《中国国企“单位依赖”结构的生成演变及其改革调适》，《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5 期，第 188～198 页。

法》，出入境办证大厅为外国人来华后或签证到期前的必经之地。^① 外国人在出入境办证大厅的现场被招募，基于自愿和知情同意的原则参与。为了适应不同外国人的语言需求，调查提供了 14 种语言版本的问卷，以确保对在华外国人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调查内容涵盖其来华前基本信息，迁移过程，来华后的生活、工作情况、居住状况和社会网络，经济依赖性，社会活动参与情况，跨文化适应与居留意愿等层面。

本文在考虑地域拓展性的前提下尽量拓展时间范围，使用了 SFRC 2019 的四个城市样本，并联合使用了 SFRC 2017、SFRC 2018 的长春样本。样本城市的选择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方面，这些城市是国家引才引智建设的重点区域，具有健全的政策体系、高效的政务服务、优质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以及良好的科技创新氛围，吸引了大量外籍高技术人才。在不同的地理区域，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均存在差异，能够反映不同层级城市的引才和留才机制。另一方面，广州、杭州、长春等 20 个城市是外籍高技术人才在华生活、工作的主要选择。这些城市因地制宜，推出了各具特色的引才计划。例如，广州发布了“广聚英才”计划，^② 杭州推出了“5050 计划”和“青荷计划”，^③ 长春实施了“长白慧谷”英才计划，^④ 义乌实施了“海外工程师”政策。^⑤ 选择这些城市作为研究样本，有助于揭示不同类型城市在引才留才方面的实践和成效。在排除了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后，依据《外国人来华工作分类标准（试行）》中外国高端人才（A 类）和外国专业人才（B 类）的相关规定，筛选出以管理人员、专业型人才、技能型人才为代表的外籍高技术人才问卷 777 份。

① 目前，外国人的在华管理是公安部、大使馆和边防检查机关的联合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使馆、领馆或者外交部委托的其他驻外机构负责在境外签发外国人入境签证。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负责有关出境入境事务的管理。公安机关及其出入境管理机构负责对外国人入境 30 天内的居留事务进行管理。

② 参见《广州出台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城市人才发展战略性文件》，https://www.gz.gov.cn/zt/qltjygadwqjxsxdgzlzfzdf/gzzxd/zxxx/content/post_3104036.html，2024 年 5 月 8 日。

③ 参见《权威解读“5050 计划”》，https://www.hhtz.gov.cn/art/2021/5/6/art_1229506796_3871456.html，2024 年 8 月 7 日；《政府工作报告摘登（二）》，https://www.hangzhou.gov.cn/art/2024/1/31/art_1229781556_59093244.html，2024 年 8 月 7 日；《2024 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项目合作大会成功举办》，https://www.hangzhou.gov.cn/art/2024/10/10/art_812262_59103428.html，2024 年 10 月 16 日。

④ 参见《长春新区“长白慧谷”英才计划暂行办法》，http://www.ccxq.gov.cn/ztl/zczd/202106/t20210603_2120922.html，2024 年 8 月 7 日。

⑤ 参见《关于印发〈义乌市引进“海外工程师”实施细则〉的通知》，https://www.yw.gov.cn/art/2023/4/7/art_1229616179_1794998.html，2024 年 8 月 7 日。

（二）变量与测量

1. 因变量：居留意愿

本文的因变量是居留意愿，分别通过跨国主义视角和移入视角构建。

从跨国主义视角出发，认为外籍高技术人才的居留意愿受到母国和中国两个方面的影响。无论是在来华前，还是在来华后，他们都在母国和中国之间进行理性权衡，考虑各种推力和拉力，最终决定自己“是否考虑移民”和“期望居留时间”。将在题目“您此次来中国，考虑向中国政府申请移民到中国吗？”中选择“在来中国前就有考虑”和“在来中国后才有考虑”，或者在题目“您这次还希望在中国待多长时间？”中选择“尽量多待一段时间”和“永久居留”表示为1，其他表示为0，形成表示有无居留意愿的二分类变量。

为了排除“在来中国前就有考虑移民”的内生性因素影响，将在题目“您此次来中国，考虑向中国政府申请移民到中国吗？”中选择“在来中国后才有考虑”，以及在题目“您这次还希望在中国待多长时间？”中选择“尽量多待一段时间”和“永久居留”的回答均标记为1，其余选项标记为0，从而形成一个二分类变量，用于表示是否有居留意愿。

2. 自变量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是社会网络和社会参与。其中，社会网络由社会网络建构意愿和社会网络建构行为测得。社会参与被操作化为外籍高技术人才社会参与认知和社会参与行为。

第一，关于族际交留意愿的测量方法如下。使用题目询问外籍高技术人才是否“愿意和中国人一起聊天”、“是否愿意和中国人做好朋友”以及“是否愿意和中国人结婚，或者是否愿意让自己的儿女与中国人结婚”，对每个题目的回答按照从“非常愿意”到“绝对不愿意”的五个等级进行测量。这种从基础性的聊天到建立信任的交友，再到最高层次的族际通婚的梯度差异，反映了族际交往的逐渐深入和从基础型、日常型到高度选择型的变化。本文将外籍高技术人才与中国人进行聊天、交友、通婚的意愿情况综合起来，然后将结果归一化为从1至5的范围内，得到一个定量变量“族际交留意愿”。

第二，使用题目“您此次来中国，在抵达时是否有人帮助您安排接待？”，将“无/自行安排行程”表示为自行安排，赋值为1；“有亲友接应”定义为“亲缘性社会网络”，赋值为2；“有客户接待”“有母国的中介公司帮助安排”“有中国的中介公司帮助安排”定义为“单位型社会网络”，赋值为3；其他表示为0。由此，形成多分类变量。然后，将家人有

来华经历定义为存在累积因果网络，赋值为 1，反之则定义为无累积因果网络，赋值为 2。

第三，为了评估外籍高技术人才的社会参与认知，本文采用了关于母国与中国“发展机会”的对比、“家庭情感联系”的对比以及“社会道德观念”的对比进行测量。首先，对每个题目，选择“中国最优”的外籍高技术人才被标记为 1，选择其他选项的被标记为 0，然后将这些标记进行加总，得到对中国认知的测量变量。其次，将选择“母国最优”的被调查者标记为 1，选择其他选项的标记为 0，然后进行加总，得到对母国认知的测量变量。最后，使用 softmax 函数进行预测，即 $y = \text{softmax}(x)$ ，取概率的最大值作为社会参与认知的特征，将中国认知表示为 1，将母国认知表示为 0。

第四，针对社会参与行为的测量方法如下。因外籍高技术人才在母国可以正式参与层次较高的政治活动，如选举和加入当地的政党，也可能会参加社团等非正式活动。在外籍高技术人才的移入地，由于国籍和部分现实原因的限制，不足以对社会参与的层次做出一一对应，故本文按照正式参与和非正式参与的类别划分外籍高技术人才的社会参与情况。因外国人在中国的商会、同乡会需要依照中国法律，由一定级别以上的政府机构进行监管、登记或者邀请，故属于正式参与^①，而志愿者聚会的准入门槛较低，属于非正式参与。

第五，本文依据外籍高技术人才的正式参与和非正式参与情况，使用题目询问“是否参加过在中国的商会/同乡聚会”以及“是否参加过在中国的志愿者聚会”，将回答“有”表示为 1，回答“没有”表示为 0，然后将两个得分进行加总，得到中国参与变量。接着，询问外籍高技术人才“是否参加过家乡的选举”以及“是否参加过家乡的社团”，将回答“有”表示为 1，回答“没有”表示为 0，然后将两个得分进行加总，得到母国参与变量。接着，本文使用 softmax 函数预测参与属性特征，将中国参与特征表示为 1，母国参与特征表示为 0。

3. 控制变量

在统计模型中，本文主要将人口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平方、教育程度作为控制变量。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

① 参见《外国商会管理暂行规定》，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4/content_2695321.htm，2023 年 5 月 8 日。

表 1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N = 777）					
变量	频数	百分比	变量	频数	百分比/均值
城市			累积因果网络		
长春	187	24. 1	有	195	25. 1
广州	350	45. 0	无	582	74. 9
杭州	142	18. 3	社会参与行为		
义乌	98	12. 6	中国参与	79	10. 2
教育水平			母国参与	698	89. 8
大学以下	52	6. 7	社会参与认知		
大学及以上	725	93. 3	中国更优	323	41. 6
支持网络			母国更优	454	58. 4
无/自己	381	49. 0	其他变量		
亲属/家人	140	18. 0	年龄		35. 4
单位/客户	118	15. 2	族际交往水平		3. 8
其他	138	17. 8			

（三）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考虑到居留意愿是一个二元结果变量（留下/离开），本文运用 Logistic 回归来探讨社会网络和社会参与对外籍高技术人才在华居留决策的影响。通过该模型，可以评估外籍高技术人才居留在中国的事件发生概率：

$$\log\left(\frac{p_i}{1 - p_i}\right) = \mu + \beta_1X_1 + \sum_{p=2}^P\beta_pX_p$$

在后续的稳健性检验中，为了避免因操作化误差导致结果有偏，使用定序测量重新测量因变量，使用题目“您这次还希望在中国待多长时间？”，将选项“尽早离开”“尽量多待一段时间”“永久居留”形成对居留意愿强弱的定量测量，并使用有序 Logistic 模型分析，具体表达形式如下：

$$Y = \mu + \beta_1X_1 + \beta_2X_2 + \sum_{p=3}^P\beta_pX_p + \varepsilon$$

四、实证分析

（一）社会网络、社会参与对外籍高技术人才居留意愿的影响

为了分析社会网络和社会参与对外籍高技术人才居留意愿的影响，本文使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构建了 4 个模型（见表 2）。模型 1 和模型 2 分别

代表了长春的外籍高技术人才的两种不同视角，即跨国主义视角和移入视角。模型 1 从跨国主义视角出发，认为外籍高技术人才的居留意愿受到母国和中国两个方面的影响。无论是在来华前，还是在来华后，他们都在母国和中国之间进行理性权衡，考虑各种推力和拉力，最终决定自己的居留地。模型 2 侧重移入视角，仅考虑外籍高技术人才在来华后的理性选择。模型 3 将焦点放在南方三城市（义乌、杭州和广州），探究社会网络和社会参与对外籍高技术人才居留意愿的影响。模型 4 将长春的数据与南方三城市组别的数据进行整合，构建了一个全国范围的模型，综合分析社会网络和社会参与对外籍高技术人才居留意愿的影响。

表 2 外籍高技术人才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变量	居留意愿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长春组	长春组	南方组	全国组
年龄 ²	0.0004 ** (0.0002)	-0.0003 (0.0002)	-0.0001 (0.0001)	-0.0002 * (0.0001)
性别	0.053 (0.384)	0.049 (0.371)	-0.348 (0.222)	-0.287 (0.188)
教育程度	-1.685 ** (0.837)	-1.913 ** (0.824)	0.547 (0.369)	0.115 (0.327)
累积因果网络	0.423 (0.414)	0.109 (0.391)	0.535 ** (0.233)	0.535 *** (0.198)
族际交往意愿	0.049 (0.207)	0.060 (0.200)	0.339 *** (0.116)	0.274 *** (0.097)
个体社会资本	0.802 * (0.451)	0.773 * (0.445)	0.292 (0.256)	0.500 ** (0.212)
亲缘支持网络	1.016 * (0.535)	0.661 (0.520)	0.265 (0.310)	0.502 * (0.259)
单位支持网络	1.864 *** (0.502)	1.570 *** (0.478)	0.825 ** (0.379)	1.047 *** (0.286)
社会参与行为	2.664 ** (1.122)	1.977 ** (0.842)	0.368 (0.332)	0.601 * (0.307)
社会参与认知	0.818 ** (0.370)	0.815 ** (0.354)	0.391 ** (0.195)	0.473 *** (0.168)
常数项	0.933 (1.243)	0.907 (1.208)	-1.274 ** (0.635)	-0.917 * (0.540)

续表

变量	居留意愿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长春组	长春组	南方组	全国组
样本数量	187	187	590	777
伪 R ²	0.257	0.211	0.076	0.090
对数似然值	-106.527	-112.777	-337.297	-458.477

注：*** 代表 $p < 0.01$ ，** 代表 $p < 0.05$ ，* 代表 $p < 0.1$ ；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下同。

1. 社会网络对外籍高技术人才居留意愿的影响

全国数据的回归结果显示，社会网络深厚的外籍高技术人才表现出更显著的居留意愿，无论是累积因果网络、族际交往意愿、个体社会资本、亲缘支持网络，还是单位支持网络，它们在模型中均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支持了研究假设。然而，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差异，这可能是受到各地区经济、文化、政策等因素的影响，需要进一步厘清其影响机制。

从模型 1 的结果可以看出，在控制了人口属性之后，长春的外籍高技术人才的社会支持网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单位支持网络（ $p < 0.01$ ）、个体人力资本和亲缘支持网络均表现出显著的统计性影响，并且系数均为正值。这说明长春外籍高技术人才的社会支持网络对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有积极的影响，为他们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和支持。与此同时，累积因果网络并未呈现显著影响，这表明相较族裔聚居网络，长春外籍高技术人才更多依赖自身的人力资本和单位提供的平台。这一发现强调了个体适应新环境的重要性，同时凸显了单位在提供支持和资源方面的关键作用。此外，长春外籍高技术人才的族际交往意愿对其居留意愿并未呈现显著影响，这表明长春外籍高技术人才也存在中国其他城市出现的浅层融入特征和过客家户特性。^① 一方面，除了在生活习惯和文化信仰等方面与中国居民存在较大差异，长春的跨国移民以留学生为主，寻求跨国职业机会和事业发展的群体规模相对较小，而从事低端行业的跨国劳工则更是凤毛麟角，无法形成类似伦敦的中华城、莱斯特的小印度、横滨和大阪的唐人街以及广州的非洲人社区那样，从饮食、教育、医疗、求职等方面都能完全自给自足的生态体系；另一方面，长春的外籍高技术人才本身具有较强的人力资本，并且大部分在一汽集团和吉林大学这类大型单位工作，从而为外籍高技术人才在衣食住行等

① 参见牛冬：《“过客家户”：广州非洲人的亲属关系和居住方式》，《开放时代》2016 年第 4 期，第 108 ~ 124 页。

方面提供了有力的社会支持。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在住宿方面，单位会提供外籍专家公寓，如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启动了总面积为194765平方米的一汽外籍专家公寓建设项目；在工作方面，单位会聘请翻译或建立外事办协助外籍人才处理事务；在社会支持方面，单位为外籍专家的配偶和子女也提供了相应的社会保障和支持。外籍高技术人才因个体人力资本较强而拥有出色的自适应能力，加之单位的社会支持网络使其生活在封闭均质的社区，故与全球跨国精英一样，他们在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文化和空间上形成了脱离本土历史文化根基的封闭群体。^①

模型2旨在排除“在来中国前就有考虑移民到中国”的内生性影响，因此仅考虑了在来中国后才考虑移民和长居的情况。结果显示，系数和方向与模型1基本一致，说明社会支持网络对外籍高技术人才的影响依然存在。这表明即使排除在来中国前的移民考虑因素，外籍高技术人才在决定居留行为时依然受到相似因素的影响。这一结果巩固了本文对外籍高技术人才移居行为影响因素的理解，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模型3显示了累积因果网络的重要性。这意味着南方城市发达的族裔网络为外籍高技术人才提供了丰富的情感性支持，对他们在异文化的适应和居留意愿的决策至关重要。同时，他们在单位支持网络方面的统计显著性得到了验证，而在亲缘支持网络方面未表现出显著性。这说明就实际支持而言，与初级社会群体相关的亲友网络提供的支持相对有限。外籍高技术人才具有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相对丰富的社会资本，因此，他们可能需要更加主流性的支持和资源，而这些需求可能超出了族裔聚居区所能提供的范围。由于社会地位和资源的差异，南方城市外籍高技术人才与中国人交往的意愿显著，反映了他们在融入当地社区和获得更广泛社会支持方面的努力和愿望。

2. 社会参与对外籍高技术人才居留意愿的影响

全国数据的回归结果显示，社会参与认知和社会参与行为显著影响外籍高技术人才的在华居留意愿。接下来，本文将分别针对不同地区展开进一步分析。

从模型1中可以发现，长春的外籍高技术人才的社会参与认知和社会参与行为可以显著影响其居留意愿。模型2旨在消除内生性影响，只考察来华后考虑移民与居留的情况，社会参与认知和社会参与行为的方向和显著性与模型1相同，显示出较稳定的解释力。目前，长春的外籍高技术人才的社会参与率远低于其在母国的参与率，证明其社会参与潜力具有很大的释放空间，需要有更多政策和活动提升其社会参与层次和水平。

^① 参见[英]莱斯利·斯科莱尔：《跨国资本家阶层》，刘欣、朱晓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

模型 3 的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 4a，即南方地区外籍高技术人才的社会参与认知对其在中国的居留意愿有显著影响。这表明，外籍高技术人才对当地社会生活的认同感和积极参与的态度在他们是否留在中国的决定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这也与当地的涉外服务体系建设密不可分。以义乌市为例，该市早在 2016 年就率先推出了外籍商友卡，该卡不仅具备支付功能，而且涵盖了公共服务和信用体系建设等多项服务，为外籍居民的生活提供了便利。此外，义乌市还建立了浙江省首个境外人员服务站，为外籍居民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提供了更全面的支持。服务站不仅组织了常规的中文角、节日庆祝和文化传播等活动，而且组建了外籍志愿者、社会工作者和调解员团队，积极促进外籍居民与当地社区的融合与互动。这些举措不仅有助于提升营商环境，而且能够调动外籍居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增进其参与感和归属感，从而构建更加和谐的社会环境。然而，模型 3 未能支持研究假设 4b，即社会参与行为对外籍高技术人才在中国的居留意愿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意味着，虽然南方地区的外籍高技术人才在族际交往意愿和社会参与认知上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但是实际参与行为并未直接影响他们选择留在中国的决定。这一发现为理解外籍高技术人才在中国的居留意愿提供了重要线索，同时凸显了社会认知和行为之间的差异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二) 稳健性检验

为避免因操作化误差导致结果有偏，本文采用了定序测量因变量的方法，使用题目“您这次还希望在中国待多长时间？”来进行测量，将选择“尽早离开”标记为 1，选择“尽量多待一段时间”标记为 2，选择“永久居留”标记为 3，从而形成对居留意愿强弱的定量测量。根据平行性检验的结果，p 值为 0.87 ($p > 0.05$)，表明数据满足平行性假设。因此，对因变量进行有序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社会网络和社会参与影响外籍高技术人才居留意愿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居留意愿		
	长春组	南方组	全国组
年龄 ²	- 0. 0003 (0. 0002)	0. 0001 (0. 0001)	0. 00001 (0. 0001)
性别	- 0. 152 (0. 348)	- 0. 341 * (0. 201)	- 0. 307 * (0. 172)
教育程度	- 0. 084 (0. 487)	0. 042 (0. 269)	0. 065 (0. 229)

续表

变量	居留意愿		
	长春组	南方组	全国组
累积因果网络	0.184 (0.364)	0.487 ** (0.192)	0.413 ** (0.166)
族际交往意愿	0.073 (0.154)	0.293 *** (0.088)	0.247 *** (0.075)
个体社会资本	0.675 * (0.368)	0.161 (0.214)	0.377 ** (0.180)
亲缘支持网络	0.547 (0.472)	0.337 (0.265)	0.516 ** (0.227)
单位支持网络	1.395 *** (0.397)	0.494 (0.301)	0.741 *** (0.234)
社会参与行为	0.897 * (0.544)	0.461 * (0.274)	0.519 ** (0.241)
社会参与认知	0.840 ** (0.336)	0.173 (0.168)	0.342 ** (0.147)
样本数量	187	590	777
伪 R ²	0.142	0.057	0.063

表 3 结果显示，假设变量系数和显著性未呈现明显变化，这意味着社会网络和社会参与变量的影响程度和统计显著性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状态。

五、结论与讨论

随着全球经济贸易合作的不断深化，各国之间的经济依存性日益增强。外籍高技术人才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高技术人才已经成为推动生产力增长和技术进步的主要引擎。外籍高技术人才的涌入不仅为当地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且增加了跨文化交流的机会。他们具备的科技、工程、医疗等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当地企业和研究机构注入了新的动力，推动了产业升级与科技创新。这一现象不仅对当地经济产生积极影响，而且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了经济与社会共同繁荣和可持续发展。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跨国迁移者与移入地居民的互动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中国正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着眼于建立科技创新型模式，正是求贤若渴之际。而跨国流动的高技术人才，是促进国外科技企业知识向本土企业转

化的重要力量。^①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引才用才留才机制是我国目前的政策重点之一。为了确保外籍高技术人才能够充分发挥其潜力，需要关注其在中国长期居留意愿的决策。本文深入理解外籍高技术人才居留意愿的形成逻辑，认为居留意愿是移民对“留”和“流”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预示个体下一步的流动方向，也反映了移民对过往一段时期迁移经历的满意度和当前城市社会互动的结果。

本文从社会网络和社会参与两个视角出发，将社会网络分为族际交往意愿、累积因果网络和支持网络，同时将社会参与定义为与之相关的社会参与认知和社会参与行为，并研究上述因素对外籍高技术人才居留意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外籍高技术人才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参与都将有助于他们在中国的居留决策。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南方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长春在吸引外籍高技术人才方面的差异。

广州、杭州、义乌均展示了较强的国际吸引力和人才结构的多样性。这些城市的外籍高技术人才大部分受雇于私人机构，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涉足多个行业领域。具体而言，广州外籍高技术人才活跃于多种从业领域，涵盖国际贸易、教育、零售、餐饮、制造业、航空、服务业等。相比之下，杭州的外籍高技术人才集中在教育、贸易和科技创新领域，而义乌的外籍高技术人才则主要从事国际贸易。广州和杭州的外籍高技术人才来源国分布较广，覆盖北美、亚洲、欧洲、大洋洲、南美洲和非洲，主要来源国包括美国、英国、日本、俄罗斯、南非、印度等。义乌则展示了独特的区域吸引力，其外籍高技术人才主要来自亚洲的也门、巴基斯坦、印度以及中东地区的阿富汗、伊拉克和约旦等国。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高技术人才和产业结构多样化使这些城市能够提供丰富的社会网络和资源，小北路、朗琴社区、金城社区、鸡鸣山社区等发育成熟的族裔社区的存在，可以降低移民迁移成本，在为其提供满足感和归属感的同时，增强了其居留意愿。虽然族裔聚居区提供的社会支持和资源有限，但是他们仍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单位和组织提供的资源，并表现出与主流社会交往的强烈愿望。长春的外籍高技术人才集中在汽车行业和教育领域，这与长春的经济结构和产业发展模式密切相关。长春的外籍高技术人才占该市来华工作群体的比例为 44.31%，这些人才主要受雇于一汽集团及其子公司、吉林大学等高校与长春光机所等科研机构。长春的外籍高技术人才主要来自德国、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和巴基斯坦，就业领域相对稳定与传统，具有丰富的社会资本，没有相对独立且发育完善的族裔聚居区，难以嵌入中国的主流社会。他们的生活和社会参与主要

① 参见胡璇：《全球研发人才的时空分布与流动网络——基于领英个人履历的分析》，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 年，第 1~4 页。

依赖单位提供的资源和支持,包括住房、语言、签证、在华生活手册,并定期举办培训、文化节、午餐会等活动。

针对以上发现,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和建议,以进一步提升我国各城市对外籍高技术人才的吸引力和完善跨国社区治理体系。

第一,应加强涉外服务体系的建设。广州和杭州设立了国际社区服务中心并提供“一站式服务”,义乌则成立了外籍志愿者服务队伍,这些举措极大地方便了外籍高技术人才的生活和工作。长春也在 2024 年 6 月 5 日启动了华阳社区外籍人员管理服务驿站。这种多样化、全方位的服务模式不仅提升了外籍高技术人才的居留意愿,而且增强了其归属感和满意度。因此,其他城市可以借鉴这些成功经验,建立完善的涉外服务体系,在外籍高技术人才居住较为集中的区域提供多语种翻译、协助签证办理、住房安置、医疗保障等一系列综合性服务,以降低外籍高技术人才的迁移成本,加深其社会参与度和融入度。此外,应建立定期反馈机制,了解外籍高技术人才的需求变化,并据此调整政策内容。

第二,应根据各城市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有针对性地引进外籍高技术人才。例如,广州和杭州的外籍高技术人才主要集中在教育、贸易和科技创新领域,而长春的外籍高技术人才则集中在汽车行业和教育领域。因此,可以根据各城市的产业特点和外籍高技术人才的行业分布,继续深化自身特色,最大限度地发挥外籍高技术人才的潜力,促进各行业间的合作。同时,提供有针对性的资金支持、国际贸易便利化措施以及优化配置的教育资源等移民基础设施体系。对符合当地产业发展需求的外籍高技术人才,应适当放宽审批条件或积分标准,并通过定期评估、动态调整确保引进人才的技能与城市发展战略相契合。

第三,针对不同类型的城市采取相应的支持策略。与义乌、广州一样具有丰富族裔社会资本和累积因果网络的城市,应重视成熟族裔社区的积极作用。族裔社区的累积因果网络可以在外籍高技术人才来华的初期降低其迁移成本,为其提供重要的社会支持和资源,增强其社会参与和融入感。

对“单位型”的外籍高技术人才来说,目前单位虽然设立了外事办或国际处等机构,向外籍高技术人才提供住房、签证等一系列支持,但是这些结构化的支持主要集中在物质层面和浅层互动上,难以满足其更深层次的情感支持和社会归属感的需求,需要进一步提供政策支持,增强其在中国的长期居留意愿。首先,可以设立心理健康支持项目,帮助外籍高技术人才应对跨文化冲突,缓解因文化差异引起的孤立感和疏离感。其次,可以通过团队建设活动、跨文化工作坊和兴趣小组等方式,加强社交网络的深度构建,促进本地员工和外籍高技术人才之间更深层次的互动,增强其在地依恋。最后,可以通过社区活动或单位组织志愿活动等方式,提高外籍高技术人才与

当地社会的互动频率和质量，增强其社会参与感，提升其社会参与层次和水平。

综上所述，国家政策在吸引和选择外籍高技术人才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诸多发达国家通过调整移民制度吸引国际人才，形成了全球性的人才竞争。美国通过不同的政策框架提出针对特定领域的人才需求，如 EB - 1A 杰出人才政策、EB - 1B 杰出教授及学术人才政策、EB - 1C 跨国公司高管政策，在科学、艺术、商业领域具有特殊能力的 EB - 2 政策，以及特殊类别国家利益豁免政策（National Interest Waiver, NIW）。^① 英国推出了全球人才签证（Global Talent Visa, GTV），吸引科学、艺术、文化等领域的顶尖专家。澳大利亚的国家创新签证（National Innovation Visa, NIV）和加拿大的全球人才计划（Global Talent Stream, GTS），则侧重关键科技、创新人才和企业家的引进。^② 这些政策的实施，不仅反映了各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对高端人才的迫切需求，而且体现了其根据自身产业结构和发展目标做出的战略性选择。

与上述国家相比，我国在政策制定和外籍高技术人才治理方面具有更高的决定权和主动性。这种体制优势使我国可以贯彻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政策，增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的整合。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探讨在华外籍高技术人才居留意愿的影响机制，以及不同地区的居留意愿差异和决策机制，有助于更有针对性地采取支持政策，更好地进行跨国社区治理，以吸引外籍高技术人才来华居留，助力中国的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实现全球化时代的共同繁荣。长春的外籍高技术人才有显著的单位性特征，地方政府和单位能够在人才引进和政策制定上扮演更加主动的角色。制定科学合理的引才引智政策，并根据国内外市场的变化进行及时调整，可以保障政策目标和执行内容的协同，进一步提升城市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经济竞争力。

（责任编辑：温莹莹 张虹）

① 参见 Employment-based Immigration: First Preference EB - 1, <https://www.uscis.gov/working-in-the-united-states/permanent-workers/employment-based-immigration-first-preference-eb-1>, 2024 年 10 月 8 日。

② 参见 Apply for the Global Talent Visa, <https://www.gov.uk/global-talent>, 2024 年 6 月 8 日；National Innovation Visa, <https://immi.homeaffairs.gov.au/visas/working-in-australia/visas-for-innovation/national-innovation-visa>, 2024 年 10 月 8 日；Program Requirements for the Global Talent Stream, <https://www.canada.ca/en/employment-social-development/services/foreign-workers/global-talent/requirements.html>, 2024 年 6 月 8 日。